

臺灣日語文學翻譯發展之現況與議題—— 以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為中心

黃意雯

本文係以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為中心，探討臺灣日語文學翻譯出版之現況與所面臨之挑戰，並藉此提出未來努力的可能方向。首先，本文認為中文與日文並列應是較為適切的排版方式，除可方便讀者與研究者外，也可擴大臺灣文學研究的領域與視野。此外，打字稿與翻譯稿的地位應並重，且需更加著力於校注與譯注工作上，因此作業流程中，除應制訂各類基準與方針外，也應採跨臺日、跨學界的集體合作方式來完成。最後，譯作等同創作，譯作價值等同學術論文；譯者等同作家，譯者地位等同論文發表者。唯有文壇、學界對譯作和譯者的價值有重新的認識，才能提升整體之翻譯品質，並將文學翻譯提高至翻譯文學的境界。

關鍵詞：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臺灣日語文學、翻譯文學、打字稿、翻譯稿

收件：2018年4月19日

修改：2018年6月6日、2018年7月11日

接受：2018年12月5日

黃意雯，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副教授，E-mail: yibunn@gmail.com。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委員與主編詳細審閱，提供寶貴意見，作者受益良多，謹致最高謝忱。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iwa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Publications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Yi-wen Huang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iterature in Japanese in colonial Taiwan, and proposes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future publication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Beyond helping readers and researchers who are already interested in, or involved with, this field, Taiwa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can also broaden and deepen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Typescripts and translations should be given an equal status, and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annotating and translating works. Moreover, in addition to the need to establish various benchmarks and guidelines, the workflow may be facilitated and more easily completed if there is more 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and thus more cooperation. Finally, as we know, "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creation"; the value of translation works is equivalent to academic papers; translators are like writers since they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ry world. As long as the literary world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cognize the value of translation works and translators,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will improv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 be promoted to the status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Keywords: publication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literature in Japanese in colonial Taiwa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ypescripts, translation manuscripts

Received: April 19, 2018

Revised: June 6, 2018, July 11, 2018

Accepted: December 5, 2018

壹、序論

1990年代是臺灣文學蓬勃發展的濫觴，臺灣文學相關系所紛紛設立，民間出版社與各縣市文化中心也前仆後繼出版發行臺灣文學作家全集。前者有1995年聯合文學出版《呂赫若小說全集》、1996年傳神福音文化出版《巫永福全集》、1998年文經社出版《張深切全集》、1998年麥田出版《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等；後者有1993年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錦連作品集》、1994年臺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郭水潭集》、1996年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楊守愚作品選集——詩歌之部》與《周定山作品選集》、1997年臺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吳新榮全集》、1998年高雄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鍾理和全集》、1999年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陳垂映集》等。

政治的解禁使得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相關的作品、報紙、雜誌等也頓時得到解放，散佚各地的史料之發掘、整理、翻譯、出版成為各界當務之急。2003年「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正式開館營運，於焉臺灣文學史料的整理與出版才取得更多國家奧援。爾後政府、學界、民間三方通力合作、挹注心力，以極力彌補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料之闕漏。

惟日治時期日語文獻史料若要出版以供閱讀研究，勢必得借助「翻譯」此語言轉換工作。戰後初期臺灣日語文學之譯介多經由陳千武、鍾肇政、葉石濤、錦連等跨世代作家之手，隨後接棒的有戰前出生的葉笛、張良澤、陌上桑、文心、月中泉等人。但隨著時空更迭，現今譯者語言能力不及「國語」曾為日語的上一世代，加上從戰前至戰後，日語無論在書寫表記或慣用文法上都產生劇烈變化，如何確保譯文品質是值得深思之議題。

由於近年以國立臺灣文學館為名，發行出版之各類作家作品、文學史料與評論、通訊刊物等甚鉅，¹其中涉及日語文學作品或史料時，其

¹ 截至2018年7月6日止，國立臺灣文學館網頁上所呈現之出版品資料，共計有566筆。詳見 https://www.nmtl.gov.tw/publicationmorelist_149.html。

翻譯出版方式更是大相逕庭。本文將以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為對象，探討其自籌備階段至今所參與的出版品中，涉及日語文學作品或史料時，翻譯出版之現況與所面臨之挑戰，並希望藉由耙梳的過程，能提出有效的解決方式，以尋找其未來之出路。此外，也期待在釐清事實的過程中，文壇和學界能給予譯者和譯作新的定位與評價。

貳、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綜觀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 1991 年通過設立「現代文學資料館」，但 1994 年調整政策將「現代文學資料館」併入「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計畫」，設「文學史料組」，1998 年行政院復將「文學史料組」提升為「國家文學館」，歷經「國家臺灣文學館」等名稱討論，於 2007 年定名為「國立臺灣文學館」。因此，「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國家臺灣文學館」、「國立臺灣文學館」所出版、共同出版或贊助出版之圖書資料，皆為本文所探討之範圍，以下併以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統稱之，其內容包含有作家的作品、文學理論和文藝批評等文學史料。

「國立臺灣文學館」之主要業務內容有展覽、推廣、研究、典藏、出版等，其中臺灣文學史料的蒐集、整理，與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之部分任務重疊。惟後者之發展重點在於當代臺灣文學的整理及研究，因此「國立臺灣文學館」更是肩負日治時期以前文學史料之重要奠基工作。由於整理、翻譯與出版文學作品或文學研究論著皆需挹注相當之人力、時間與金錢，且在讀者、銷路有限之情況下，勢必得藉由國家之力量才能順利推動。此外，以國家資源成就之事業，也較可確保出版品之水準與品質。

以下為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中，原文含有日語的文學史料之出版情形。自 1998 年起以「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為名，至 2013 年以「國立臺灣文學館」為名止，共計有 12 套，茲依時間順序整

理如下：

表 1

國立臺灣文學館日語翻譯出版品

出版品名	計畫主持人	譯者	出版年月	日文原文呈現形式
楊逵全集	彭小妍	葉 笛 涂翠花 邱振瑞	1998.6	全 14 冊，中日文稿並列，日文原文採打字稿
呂赫若日記	陳萬益	鍾瑞芳	2004.12	全二冊，分手稿本與中譯本各一冊，日文手稿本採原稿全彩掃描複製
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	黃英哲	王惠珍等 11 人	2006.10	全四冊，未收錄日文原文 ²
龍瑛宗全集	陳萬益	陳千武 林至潔 葉 笛	2006.11 2008.4	中文卷全八冊、日本語版全六冊， ³ 日本語版中既刊稿採復刻版，未刊手稿採打字稿
葉石濤全集	彭瑞金	彭 萱	2006.12 2008.3 2009.11	全 23 冊， ⁴ 中日文稿並列，日文原文採打字稿
葉笛全集	戴文鋒	葉 笛 葉蓁蓁	2007.5	全 18 冊，新詩、散文日文作品置於書後半，不並列參照。部份散文有中譯

(續下頁)

² 本套書是黃英哲主持的「日治時期臺灣文學日文史料蒐集翻譯計畫」之部分成果，而該計畫執行不久，擔任顧問的中島利郎、下村作次郎也出版了《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文藝評論集》(由東京綠蔭書房於 2001 年出版)。

³ 《龍瑛宗全集》包括「中文卷」、「日本語版」兩部分，分兩階段出版。「中文卷」共計八冊，包括龍瑛宗所有日文原著的中譯，及其中文原著；「日本語版」收錄龍瑛宗所有日文原著作品，包括已刊和未刊稿，總計六冊。

⁴ 本全集原定出版 20 冊，包括小說卷五冊、隨筆卷七冊、評論卷七冊、資料卷一冊，分於 2006 年、2008 年出版，爾後 2009 年再出版翻譯卷和資料卷等三冊續編。

表 1

國立臺灣文學館日語翻譯出版品（續）

出版品名	計畫 主持人	譯者	出版 年月	日文原文呈現形式
吳新榮日記全集	張良澤	陳金胡等	2007.11	全 11 冊，日文原文置於書前半採打字稿，譯文置於書後半
七色之心 ⁵	下村作 次郎 陳淑容	劉肖雲 葉思婉	2008.2	全一冊，未收錄日文原文
錦連全集	阮美慧	錦 連 張月環 ⁶	2010.10	全 13 冊，詩作中日文分冊，不並列參照；小說中日文稿並列
楊雲萍全集	林瑞明 許雪姬	黃秀敏 等四人	2011.2	全八冊，中日文稿並列，日文原文採打字稿
黃得時全集	江寶釵	葉石濤 等八人	2012.12	全 11 冊，中日文稿並列，日文原文採打字稿
銀鈴會同人誌 (1945—1949)	黃意雯	杉森藍	2013.11	全二冊，中日文稿並列，日文原文採打字稿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出版品類型方面可大分為作家的作品和文藝史料兩大類。首發之《楊逵全集》即為「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委託學界執行「楊逵全集編譯計畫」之成果。此計畫由中央研究院彭小妍擔任召集人，組織跨臺日兩地作家、學者、譯者之「《楊逵全集》編輯委員會」，歷時五年才分批完成。此類國家學術單位透過計畫案，委託學界執行之成果，也成為往後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陸續完成之模式。

作家作品類出版品中，除《呂赫若日記》與《吳新榮日記全集》僅

⁵ 本書為春暉出版社出版，國立臺灣文學館贊助。

⁶ 詩作皆為錦連自譯；小說則為部分自譯，部分張月環譯。

收錄作家日記外，其他皆非「文集」，而是包含各文類與資料之「全集」。《呂赫若日記》與《吳新榮日記全集》則因 1995 年聯合文學已出版《呂赫若小說全集》、1997 年臺南縣立文化中心已出版《吳新榮全集》，再出版日記資料是為補齊作家全集之遺漏，以豐富全集之內容，並讓作家作品研究可獲得更全面之佐證。日記之重要性如下所述：

日記是抒吐心靈最真實的記錄，能自然流露作者的心情、思想和行事。日記也是作家宣洩苦悶的最佳管道。日記雖是記錄每天生活瑣事，可是這些瑣事連貫多年之後，就成為珍貴的「史料」，可做為大時代的見證亦可填補歷史的空缺。（汪淑珍、白乃遠，2012，頁 40）

因此，臺灣文學作家全集出版之演化，至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時，除創作文本外，也盡可能網羅作家之照片、影像、手稿、日記、書信等，使讀者能藉由這些資料，更進一步了解作家創作過程、人生經歷、思想形塑之成因等。《楊逵全集》、《葉石濤全集》、《葉笛全集》、《錦連全集》便是朝此方向規劃整理，除依作品類別分為小說、隨筆、詩、散文、評論、翻譯各卷外，還有集結日記、書信、生平年表、作品目錄、照片、手稿、影像等資料卷，可謂工程浩大，並結合作家本人及其家屬後代、臺日學界之力量乃得以完成。尤其《葉石濤全集》共計 23 冊，前後於 2006 年、2008 年、2009 年分三次出版才俱完備。

於焉，在民間出版社、各縣市文化中心，以及後期加入的國立臺灣文學館三方之共同努力下，包含日治時期與戰後第一代作家中，曾以日文創作者，如：王詩琅、巫永福、王昶雄、楊逵、呂赫若、龍瑛宗、張文環、吳濁流、鍾理和、陳千武、葉石濤等，隨著作家全集之整理出版，其日文作品也得以在轉換語言形式為中文後親近現今讀者。

相對於臺灣文學史上具指標性之臺灣日語作家，其作品譯本幾乎皆已問世，文藝史料目前僅有《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與

《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兩套。林肇豐（2006）於《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簡介中云：

過往對於日治時期的翻譯作品，較多集中在作家全集及作品的整理翻譯，關於文學理論和文藝批評的整理則較少，但這是建構文學史的重要環節，實不容忽視。〔……〕《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的內容為日治時期發表於雜誌刊物的文學理論、文藝批評、文學史論述等資料之整理翻譯，研究團隊廣泛搜羅《福爾摩沙》、《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臺灣藝術》、《臺灣文學》、《文藝臺灣》、《華麗島》、《愛書》、《媽祖》、《翔風》、《民俗臺灣》、《旬刊臺新》、《臺灣時報》、《文學評論》、《文學案內》、《日本學藝新聞》等二十餘種刊物、近四百篇日文文藝評論，〔……〕語言的隔閡經常阻滯研究者對日治時期臺灣文學與藝術發展的理解，經由專家學者整理、翻譯、出版的《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則能夠解決此問題。本套書的出版對於日治時期文藝批評與文學理論的耙梳、建構具有重大意義，而透過本書學者們也得以更全面地掌握作家作品、文藝理論、論戰與時代背景之間的互動關聯，統整日治時期的文學史，為臺灣文學的研究開啟新窗。（第1段）

此外，文藝史料的整理翻譯還可起兩項作用，一為補齊作家全集之遺漏，二為發掘出土作品量較少、在文壇時間較短、知名度不若文學大家之小作家及其作品。

以龍瑛宗擔任《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及文化欄主編時（1946年2月24日至10月24日）所發表的作品為例，《龍瑛宗全集》中並未收錄的作品有5月30日以「風人」為筆名發表於文藝欄的〈「飯桶」論（「飯桶」論）〉、分別於8月1日和8月16日以「魯敏遜」為筆名發表於文化欄的〈來歷（来歴）〉和〈臺南的薔薇（臺南の薔薇）〉、

9月19日以「李志陽」為筆名發表於文化欄的〈從臺南到臺北（臺南から臺北へ）〉四篇，⁷若《中華日報》文藝史料能早先出土，也可使《龍瑛宗全集》作為龍瑛宗研究之基礎核心資料，更實至名歸。

而1932年4月15日起由週刊型態轉為日刊之《臺灣新民報》，目前雖然只保留零散片段資料，⁸但1933年份的《臺灣新民報》卻是提供研究臺灣近代文學形成時期不可或缺的資料，除尚未出土的有賴慶⁹〈女性的悲曲（女性の悲曲）〉、林敬璋〈悲傷的天鵝（嘆きの白鳥）〉，還有較鮮為人知的詹紹松〈枯霜的命運（霜かれた運命）〉等。

因此，從《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乃至《興南新聞》，又從《臺灣日日新報》、¹⁰《臺灣新聞》、《臺南新報》、《臺灣日報》、《新高新報》乃至《中華日報》等，報刊中日語文學作品或文藝評論的整理翻譯是「國立臺灣文學館」接下來應發展之方向。事實上，「國立臺灣文學館」委託學界之「《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副刊整理及譯注計畫」，已於2016年12月完成，並於2018年底出版；而「《臺灣新民報》日文文藝史料整理及譯注計畫（一）」目前也正進行中，唯有透過更多的文藝史料翻譯出版，才可使更多的作家全集補齊完備，並發掘更多目前較少人討論，卻又因苦無資料而無從使力的作家作品。

參、以何為本進行翻譯？

「日據時代作品日文翻譯的問題，是全集編撰上掌握成敗關鍵的環節之一」（彭小妍，1998，頁33）；又「『翻譯』是增加全集製作的難度，相對也是提升全集價值之所在」（汪淑珍、白乃遠，2012，頁

⁷ 有關龍瑛宗著作目錄和發表署名，請參閱王惠珍（2014，頁405—434）。

⁸ 現存的《臺灣新民報》只可見由六然居資料室、國立臺灣文學館及國立歷史博物館所典藏之1932年4月15日至5月31日、1933年5月2日至7月8日、1933年9月1日至11月30日、1939年11月25日至12月4日、1940年5月5日至5月26日日刊。

⁹ 有關賴慶之研究，請參閱柳書琴（2012）。

¹⁰ 《臺灣日日新報》目前已電子數位化，可供線上檢索瀏覽。

38)。由此可見，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中，臺灣日語文學之翻譯是項極具挑戰的工作，也是影響出版品品質與價值之重要關鍵。然而影響翻譯品質之兩大主要變因，一是譯者，另一是原文。

在譯者方面，日治時期由於「國語」為日語，當時並無日翻中之需要，戰後初期，跨語言世代的作家如：葉石濤、鍾肇政、錦連、陳千武、鄭清文、廖清秀、林鍾隆、葉笛，以及翻譯家如：林至潔、月中泉、李永熾、張良澤、魏廷朝、文心、陌上桑等，皆是臺灣日語文學翻譯之推手。爾後，又有作家後代接棒投入翻譯行列，如：陳千武之子陳明臺、葉笛之女葉蓁蓁、葉步月之女葉思婉等，更是日語文學翻譯界佳話。

然而，戰後至今已逾七十載，後繼譯者也出現斷層，其原因在於全臺各大學成立日語相關系所者雖眾，但日治時期文學作品與現今日語已產生落差，加以人材培養有教育、語言學、文化、政經等多元面向，即便有意朝文學領域深入，也多囿於日本文學。更何況文學作品之翻譯不同於商業文件，絕非只是兩種語言之間對等的符號轉換，其要求的藝術性極高，人才的培育非一蹴可幾。陳萬益（2007）曾提及研究所學生來源逐漸有單一化趨勢，並期待日文系畢業學生能從事日治時期的研究。其實，具日文能力之生源除可直接從事研究外，更可加入翻譯工作行列，以擴大現有基礎的文獻史料、對象，乃至研究視野。

有鑑於此，現階段臺灣日語文學之翻譯，已不能再像以往，只憑譯者一人單打獨鬥、埋首於書桌前搖筆桿，做文字轉換工作。語言是會隨時代而改變的，因此我們的世代從事臺灣日語文學之翻譯，必須結合臺日雙方之人力打群體戰。

首先，日文原稿和中文譯稿就必須兵分兩路，分頭進行。日文原稿為翻譯所本，原稿的形態也左右譯文產出的品質，目前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中，日文原文的呈現形式有：（1）未收錄日文原文；（2）原文採打字稿，其中又有中日文稿並列、中日文稿分置書前半或後半、中日文稿分冊置放者；（3）原文復刻掃描，目前可見手稿和排版刊登稿。

原文復刻掃描也許較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作品當初之樣態，包含作家個人用字習慣、¹¹ 總督府檢閱報章雜誌之痕跡等，尤其手稿還能窺見作家推敲斟酌用字的過程、筆跡所展現的文字性格、文人雅趣的手繪插圖，可頓時拉近讀者與作家間的距離，平添許多閱讀樂趣。然而，對現今的日語讀者而言，不僅手稿日文必須經判讀，即便是排版刊登稿，因日文書寫方式在戰前戰後改變甚劇，也需先經日籍學者判讀、校注。例如漢字使用在戰後歷經多次改革，2010 年內閣告示之「常用漢字表」僅止於 2,136 個字種，大大限縮了漢字使用的範圍。此外，戰前所使用的舊字體和現今日語教育所授之新字體間也有很大的差異。臺灣因使用漢字較日本廣而深，在漢字理解上還不至於造成太大障礙，但在假名使用上還有「歷史假名遣」和「現代假名遣」的差異問題。¹² 加以當時編輯印刷品質不如今日發達，異體字、俗字、錯字、誤植，乃至因作家個人日文不夠純熟，誤用現象頻繁可見。¹³

此外，史料之保存情形也是影響判讀結果的另一主要因素。《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之委託原稿是以刻鋼板油印方式發行的刊物，加上文學館所提供之原稿已經多手複印。黃意雯（2013）就寫到：

故部分原文或模糊難辨，或缺頁錯置，或誤字漏字，或俗字略字，或日中英等各種語言夾雜等，總之在整理成正確打字稿時已困難重重。（頁 IX—XI）

彭小妍（1998）就《楊逵全集》編輯經驗曾言：

¹¹ 例如《楊逵全集》在編輯體例後，特別附上「楊逵使用特殊用字對照表」，即為保留作家個人用字習慣，以供讀者參考。

¹² 「歷史假名遣（歷史的仮名遣い）」為日本明治時期至戰前，於學校和公文等所使用的假名使用規則，偏重語源和文法主義，但戰後改實行採表音主義的「現代假名遣（現代仮名遣い）」。¹³ 臺灣日語作家因是戰前受日語教育，故即便在戰後繼續以日文寫作，仍以「歷史假名遣」為主，和戰後臺日兩地學校日語教育所授「現代假名遣」並不相同。

¹³ 例如張文環小說中的日語誤用，可參閱黃意雯與高野史惠（2007）。又鍾筆政情書中的日語誤用，可參閱高橋明郎（2016a, 2016b）等論文。

學術研究應該根據原文為主，日據時代全集最理想的作法是中日對照排版。在臺灣，日文的排版校對又是一大挑戰。〔……〕東京大學的河原功先生開始校訂楊逵的日文稿時，發現打字行打出來的稿件錯誤連篇，校訂起來痛苦不堪，於是我們立即徵求日文碩士班的畢業生負責打字工作，情形便大為改善。（頁 33）

的確，對現今的日語讀者或學術研究者而言，日文原文採打字稿的中日文稿並列對照，應是較理想的出版方式，《楊逵全集》、《葉石濤全集》、《楊雲萍全集》、《黃得時全集》、《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皆採此一形式，尤其近幾年出版品此一形式也成主流。但高橋明郎（2016b）在比對《黃得時全集》中的日文打字稿時提及：

但很遺憾的是此全集的日文打字稍嫌不夠精準。我將幾個較特殊的表現列出，比對當初刊載時的活字印刷後，發現事實上原刊物中有多處的表現是沒問題的。也就是對照《臺灣時報》、《臺灣新文學》、《文藝臺灣》、《臺灣文學》原稿和全集內容，有許多判讀錯誤。（頁 198）¹⁴

由此可見，花費人力、經費的打字稿，不能僅止於打字輸入工作，人力方面也不能僅為識日文者，而必須以加入日籍學者，參考日本在出版文學作品集的方式，¹⁵經嚴謹考證後加入適當的注解。因此，較理想的打字作業至少需有兩名以上日籍學者，分別負責判讀注解與校對，又因文章內容往往涉及臺灣或中國人名、臺灣社會文化或風土民情，甚至中文或臺語詞彙直接置入之表現，若能再加入諳日語之臺灣學者更佳。此外，日文打字稿之團隊成員還必須於作業前擬訂編輯體例、校訂原

¹⁴ 本段引文中文為本文作者自譯。

¹⁵ 根據林水福（1998），日本作家全集的編纂，除本文外，還包含凡例、對所收錄文章的注解、校異表、作家年譜、各卷解題、隨頁注解等，且多為精製本，編排、印刷、裝訂皆極精美。

則、注解方針、注解文字使用規範、漢字使用基準、標點符號使用方式等，才能真正發揮日文打字稿該有的效益。目前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中，除《楊逵全集》和《吳新榮日記全集》外，日文打字稿並無太多注解，因此譯者翻譯時所依底本一旦錯誤頻頻，也就難保譯文品質了。

《楊逵全集》編輯委員陣容龐大，從召集人、顧問、編輯委員、日文編輯、譯者到助理編輯皆為一時之選，且分工細膩、層層把關，因此在諸多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中，雖出版年代最早，但內容完備而周詳，至今仍被奉為圭臬。

而《吳新榮日記全集》除內容本身集結了吳新榮 1933 年至 1967 年的日記為珍貴的文獻外，每頁文末占幅頗多的腳注，介紹了文句間提及的人物、文學作品的背後歷史、臺灣的社會文化等，都非常具可讀性，也大為提高全集的價值。此外，在編輯凡例上，《吳新榮日記全集》也提供許多值得借鏡之處。從段落格式、標點符號、日語表記，到漢字、錯字、贅字、漏字、空字的處理原則等，一一條列有 15 項之多，這若非主編張良澤本身非但深諳日文，也經手翻譯過諸多作品所累積之厚實底蘊外，是無法成就的。曾主持過《呂赫若日記》、《龍瑛宗全集》等出版計畫的陳萬益（1998）於《現階段臺灣文學的建設工程——談日據時代作家全集的編纂》中，也高度肯定張良澤對日治時期作家全集編輯出版的貢獻：

日據時代作家全集的整理，首應歸功於張良澤和李南衡，他們在嚴苛的時代環境下，孤軍奮戰，編輯出版鍾理和、吳濁流、王詩琅、吳新榮、賴和的全集，即使受限於政治的高壓，不能完全忠實於作者，如淘汰鍾理和、吳新榮的日記，或者割愛部份重要的篇章，如吳濁流的《無花果》、《臺灣連翹》，或者仍有史料的疏漏，然而，這幾部全集的貢獻至深且鉅，如果不是美麗島事件的鉅變，張良澤不得不赴日不歸，張文環和楊逵全集也都應在其手中陸續完成。（頁 31—32）

儘管翻譯是以日文原文為本，但日文打字稿的呈現不應只為翻譯而存在，它不但可照顧到臺日兩地的日語讀者、臺灣文學研究者，更可拓展新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目前的臺灣文學研究多以作家作品論為中心，對於從語言學角度出發來探討作家用詞用語選擇、語言表現特徵的文學語言研究並不多，但在日本的文學研究範疇中，文體、文章論已行之有年，近年更有透過統計學的方法分析文體文章，而這些日文打字稿即提供了此類研究的寶貴資料庫。再者，從日本語教育的角度觀之，正確精準的日文打字稿也可檢視在臺日本語教育的成果，成為第二語言習得和誤用分析研究的比較對象。

因此，日文打字稿如何在轉化成現今讀者可閱讀的日文之同時，也盡量保留作家原本用字。例如：考量臺灣作家本身的日語程度，校對時在不影響文意的理解下，盡量保留原有之不自然表現而不直接做校訂；¹⁶ 日治時期日語作品中常有臺語、中文夾雜的情形，¹⁷ 在譯成中文時如何技巧性地保留作者原本使用的臺語、中文，而不讓讀者誤以為是譯者翻譯的結果，進退之間的取捨往往需經縝密的思考，以求最佳的解決方式。

肆、文學翻譯？翻譯文學？

有完整校訂後的日文打字稿為後盾，接下來就可著手進行翻譯工

¹⁶ 以龍瑛宗（1946）的〈傳統的內在力量——吳濁流的《胡志明》——〉（伝統の潜在力—吳濁流氏の「胡志明」—）開頭第一句為例：「伝統といふのは、ある民族がある風土と結びつけてある政治的社会的環境の下に、長い歳月の涯しない繰り返しの末に形成された、ある民族の精神と生活の表現様式とも名づけるものであらうが、それは精神文化、あるひは生活文化として、ある民族に所属された個人の生涯を規制するものである」（第四版）。文中的他動詞「結びつけてある」應以自動詞「結びついている」較為自然，而「名ける」應為「名づける」。

¹⁷ 葉石濤（1946）在〈關於菸草〉（煙草に就いて）一文中，就曾出現「小人閑居為不善」、「沒有辦法」兩句有趣的中文表現，引文中作者以底線表示：「始めは、小人閑居為不善をなす式のやからが、好奇心半分でけむりをたてだしたのであるが、哀れ、道心堅固の人々もまきこまれ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つた。〔……〕僕も香りのたかい煙草は大好きである。だが沒有辦法！。しかも安煙草の中にパイアの葉やおが屑の入つてゐるのものもあるに至つては貧乏人泣かせである」（第四版）。

作。以往文學翻譯都是立基於外國文學，以進行文字的轉換與譯介。但是，日治時期臺灣日語文學作品為道地的臺灣文學內涵，日本文學形式，在作家執筆時已經過文化的轉化，如今又要將其還原，這就如同將純果汁轉化成濃縮果汁後，又需將濃縮果汁還原般，尷尬的是還原後的濃縮果汁又常常與純果汁被放在同一天秤上來秤斤論兩，可見譯者處境之窘。尤其將中日文對照出版時，除非是作家自譯（self-translation 或 auto-translation）作品，¹⁸ 否則譯者承受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作家自譯作品除了具權威性，沒有遭挑戰誤譯的餘地外，為求文字的藝術性、結構的完整性，作家還保有「改寫」¹⁹ 的特權。但譯者就只能緊貼字句、忠於原文地進行翻譯，否則誤譯、漏譯、詞不達意等現象就判然裸露。

然，不完美的原文，又如何轉化成完美的譯文？或者應說：是否該轉化成完美的譯文？處理作家作品問題較小，因作家本身日文能力已具一定水準，有些人在發表前還會請日籍友人修改，投稿後主編也會再審閱，在翻譯上問題較不大。但若是像報紙上一般讀者的投稿，或像《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中的《緣草》因草創時是為臺中地區有志文學的青年初試啼聲之園地，因此語焉不詳、日語誤用現象頗多，翻譯時不誤讀、誤譯是基本原則，但如何將當時臺灣人之青澀日語如實呈現又是一大難題。尤其當下臺灣日語文學翻譯品質良莠不齊，在讀者對譯文還不具信任的前提下，原文缺陷的忠實呈現反而會成為指責譯者的聲浪，因此不同作者的文章都不分文體，清一色成為美文之怪異現象也就

¹⁸ 當然，作家自譯作品時又有別於翻譯他人作品時所會面臨的不同挑戰，譬如必須考量可譯／不可譯的議題。相關討論參見單德興（2016，頁 219—223）。

¹⁹ 戰後許多跨世代作家會將自己的日文作品以中文重新翻譯、詮釋和改寫後發表，此種型態的「改寫」因可不必遷就原文逐句翻譯，更已加入了許多異於原文的新元素，可視為一種重新創作。因此，此處的「改寫」一詞，與翻譯研究學派學者勒菲弗爾（2004／2010）提出的「改寫」（rewriting）概念不盡相同。勒菲弗爾認為翻譯、編史、選集、批評、編輯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寫，它們都從某種程度上對原文進行了改變和操控，其中翻譯是最為明顯、最有影響的改寫，因為它在另一種文化中樹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讓他們突破了原文文化的界限。他也指出，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改寫主要受到意識形態（ideology）和詩學形態（poetology）兩方面的限制。改寫者往往會對原作進行一定程度上的調整，以使其與改寫者所處時期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相符，從而達到讓改寫的作品被盡可能多的讀者接受之目的。

不足為奇了。由此可見，在日語文學翻譯沒有規範的當前，籠統的「誤譯」聲浪很容易接踵而來，這些都有待日語文學的譯評風氣與制度之建立。

因此，在處理不成熟的日文翻譯時，譯者所採取的姿態、翻譯技巧與策略，也須隨之改變。簡言之，面對成熟的原文時，譯者可被動地接受原文訊息進行翻譯，但若面對不成熟的原文時，譯者就須積極介入與強力詮釋，適時的添譯或改譯，使譯者不再是「隱形」(invisibility)的存在，並透過趨近「異化」(foreignization)策略的不流暢或疏遠之翻譯風格，來突顯原文的異質性。²⁰此外，為避免讀者在閱讀此類譯文時誤以為是譯者的能力不足或粗心所犯謬誤，如單德興(2013, 2016)所提，利用譯序、譯注、前言、後語、訪談、參考資料等「附文本」(paratext)來引導讀者了解作者和原作也是可行的。

在文學翻譯中，詩歌的翻譯應是最棘手的問題。以翻譯文本類型來看，詩歌是最典型的表達類文本(expressive text)，²¹其：

翻文應該傳遞原語的審美性和藝術形式，翻譯應該使用「同一」策略，即譯者應採用原語作者的觀點。(芒迪，2001 / 2007，頁 93)

由此可見，在詩歌翻譯上，對譯者所使用的文字、形式等要求，勢必較其他文學作品高出許多。陶振孝(2006)在討論日本現代詩歌的翻譯時，

²⁰ 「隱形」(invisibility)是韋努提(Venuti, 2008)使用的術語，他認為隱形的成因通常是譯者在當代英美文化中，傾向譯成「流暢」的英語，譯出一篇道地而「可讀」的譯文，因此造成一種「透明的幻覺」。也就是說，這樣的譯文看上去根本不是譯文，而是原作。他在討論隱形時，結合歸化(domestication)與異化(foreignization)兩類翻譯策略來討論，意即歸化要求翻譯必須以透明、流暢和隱形的方式進行，把譯文的異質性成分減到最少。反之，異化要求選擇一個外語文本，並採用目的語文化價值觀所排斥的翻譯方法。

²¹ 德國翻譯功能學派開創者賴斯(Katharina Reiss)主張文本類型所具備的功能會決定翻譯的方法，而提出：資訊類文本(information text)、表達類文本(expressive text)、操作類文本(operative text)三種文本類型，及其翻譯方法。參見Reiss(1971/2000)。

曾提及英國詩人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將詩歌的翻譯方法分為替換法、解釋法和模擬法三種。若依約翰·德萊頓的分類方式來看，譯者本身若不兼具詩人的身分，大多也僅能保守地使用相對應的目的語，把原語逐字逐句譯出，且在語順、行數等形式上保持原貌的替換法，無法如解釋法般大幅改變原詩的形式或詞序，更遑論採從原詩中得到啟發後，在原詩基礎上重新創作新詩的模擬法了。

許達然(2007)在《葉笛全集》的〈總導讀〉中敘述：

一般都認為詮釋是讀者的事，不是譯者的。譯者直譯就夠了，畢竟直譯已經不容易了。至於語言更凝縮，可能有節奏甚至押韻的詩的翻譯，不管是不是詩人，也不管有沒有翻譯經驗，大家的意見更多了。[……]中國和日本古典文學的翻譯大家韋理(1889—1966)認為「在所有的詩當中，日本詩是最不能翻譯的。」他指的是日本古典詩，但日本近代詩的翻譯恐怕更難了。無論如何，不管是詩、散文還是小說，葉笛認為都是可被翻譯的文類，總是忠實地、嚴謹地以優美的文筆譯出，按照作者的原意，建造作者的語言所居住的屋子。(頁30—31)

許達然除了肯定葉笛身為作家與翻譯家，在兩領域間游刃有餘、完美詮釋外，也一語道破文學作品中詩作翻譯之困境。錦連也是身兼作家與翻譯家之獨厚之人，阮美慧(2011)在《錦連全集》的〈編序〉中也提到：

錦連先生對自己的創作十分珍視，詩作翻譯從不假手他人，原因在於：他認為詩作經由他人翻譯，往往難以掌握詩人創作的精髓，甚且誤譯作者的詩意，因此，日文詩部分，若錦連先生未曾翻譯，則採原詩收錄，並未譯成中文，這部分，則有待錦連先生來日完成出版。(頁6)

而如葉笛、錦連般，兼具作家與翻譯家身份者難覓，也是處理詩作翻譯上的最大困難。能成就此番事業的方法之一還是比照日文打字稿採群體戰術，結合臺日雙方人才，以臺籍作家為主進行翻譯，日籍文學研究者為輔進行審稿，應可兼顧譯文之藝術性與準確性。此翻譯作業流程不僅只限於詩作，也可擴及所有文類，以確保翻譯品質。

此外，完整而嚴謹的翻譯稿，除了有正確的譯文外，注解的工作也不容忽視。特別是臺灣日語文學的翻譯，因當時日本、臺灣兩地文化交流頻繁，且各種文學新思潮如泉湧般注入，作品的翻譯除語言文字的轉換外，還必須同時肩負文化意涵的傳遞，因此譯文中的注解就擔任起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功能。單德興（2013）也在討論經典文學翻譯時論及：

翻譯如此富於文字、文本、文學、文化的涵養、聯想與暗示的經典之作時，必須借助於譯注才可能較為忠實、周延地呈現原作。
（頁 57）

但，注解何者須注？何者不須注？其斷定標準為何？注解時要如何取捨才能詳而不冗，短而不略？而前一階段日文打字稿中針對日語表現所作的注解，又如何盡量保留並呈現在中文翻譯？尤其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以套書居多，在時間壓力下，譯者勢必無法由一人獨挑大樑，因此，作業前譯者間對於格式、標點、用字等不但要有一套共同的基準外，也必須制訂注解的統一格式。例如：對應日文打字稿注解的中文規範、注解字數的限制，以及注解人物時原文名、生年、出生地等訊息的陳列順序等。為求注解的完整性，從日文輸入者、日文校對者、譯者、日文審稿者，乃至臺灣文學顧問都應是整個出版品的校注者，惟有透過嚴格的層層把關，才能減少錯誤並顧及周詳。

若要求更嚴謹的作業方式，則同一作家之作品應交由同一譯者進行翻譯；針對已有中文作品集結出版的作家，應於事前閱讀該作家作品以模仿其用字用語與文體風格等；即使翻譯同一作家作品也應針對文章

性質在文體上作適當調整；考量作者身分不同（尤其是報紙中的讀者投稿）應揣摩其可能用語或語氣等，都是翻譯前的準備工作。

即便所有的事前準備工作和作業流程都一應俱全，但文學作品的翻譯還有一項事後的工作，即是作品名的翻譯。以龍瑛宗的作品譯名為例，比對《龍瑛宗全集》和臺灣客家文學館網站上的作品目錄，²²可發現許多譯名並不一致，些微差者如〈婦女與經濟〉和〈女性與經濟〉，還可臆測得知為同一作品，但如〈入海濁江、比高〉和〈「濁海海灣」「一較長短」〉，譯名差異就較大，該文為龍瑛宗發表在《中華日報》「名著巡禮」系列的作品，原文為「にござえ たけくらべ」，是介紹日本女性作家樋口一葉的兩部作品，也許現行較為熟知的〈濁江〉、〈比肩〉譯法，反而恰當。因此，國立臺灣文學館雖已建置「臺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但重新審視現有譯名之適切性，以提供各文學大家作品之譯名參考依據，也是國立臺灣文學館的另一課題。

文學翻譯的最高目標就是成為翻譯文學，好的譯作其文學性甚至可以超越原作。日本作家森鷗外翻譯安徒生的《即興詩人》（即興詩人），即以典雅的仿古文體著稱，其流暢優美的文字，佐以用中國古典呈現西洋典故，被譽為「勝過原作」的翻譯。日本岩波文庫甚至將森鷗外的翻譯作品，以代表日本文學的綠帶封面印刷出版，成為其超越翻譯而成為日本文學之最佳佐證。

翻譯文學不僅只是譯介，還具有獨自的文學價值，文學作品的翻譯既是文學創作，譯者就應如作家般給予評價與尊重。詩人余光中（2012）說：

翻譯家的名氣不及作家，而其權威也不及學者。但翻譯家的文筆不遜於作家，而其學問也不遜於學者。翻譯家其實是沒有作品的作家，不寫論文的學者。（頁 16—17）

²² 參見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author_main.htm。

彭小妍（1998）也說：

由於翻譯作品一向不算是學術成績，因此學者大多寧可專注於撰寫研究論文，不願意分出時間來從事翻譯。就實用性而言，一篇重要的翻譯恐怕比學術論文更有價值，也比較有可能成為暢銷書。（頁 34）

檢視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中，版權頁上通常標有作者和編輯等資料，但除《龍瑛宗全集》、《楊雲萍全集》、《七色之心》外，²³多未載明譯者，可見翻譯工作與譯者一直不受重視。以往臺灣文壇與研究工作者只在意文學史料是否被翻譯出土，而忽略譯作的品質。但譯者就如同作家，譯文就如同作品，好的譯者，其譯作相信也有一定的品質。因此，明示譯者資訊除了尊重也是責任，期待他能對讀者，也對自己翻譯的作品做承諾。所幸的是《葉笛全集》、《錦連全集》、《楊達全集》、《葉石濤全集》等作家全集在出版時皆有收錄作家個人翻譯的作品——「翻譯卷」，可見翻譯作品也是一種創作的價值觀是無庸置疑的。

在學界方面也是肯定翻譯工作和譯者之價值的。陳瑞山（2014）表示：

一般人對翻譯作品的產出過程仍停留在很粗淺的階段，往往忽略了其過程中所牽涉到的複雜層次，如跨文化語言符號的轉換、專業的知識、文法與修辭的涵養、翻譯前後譯者做為讀者之判斷、對文本的分析力等，實不亞於學術論文的產出。（頁 157）

目前文學作品的譯者多為作家或學者。作家從事文學翻譯，很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作家活動的一環。但將來若需更多學者投入此相關工作，勢必學術界也要認可譯者等同論文發表者，譯作等同論文，並在學術地

²³ 《黃得時全集》版權頁上標示的是日文團隊，未明示為譯者。

位、升等考核方面也都承認其正當性。事實上教育部已於 2013 年訂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試辦學校計畫」，盼能：

鼓勵學校結合職涯發展，引導教師專長分流，鼓勵教師投入教學及技術應用實務領域，俾利學校多元化發展〔……〕。（教育部，2013，第 1 段）

因此，透過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學界譯者可透過產學合作研究方式，將翻譯作品作為技術升等之代表成果或參考成果。此外，專任教師升等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中亦規定：

符合科技部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經該部審查通過出版之經典譯注，得列為參考作。（教育部，2016，「學校作業程序」）

由此可見，翻譯作品及譯者之學術地位已被正式認同，而隨著教育部等相關部會的正視，在教師專長之分流趨勢下，將來勢必會有更多學者願意投入文學作品之翻譯工作。

最後，目前文學出版品先求有再求好之作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了基本的共識和一套標準的作業流程後，將來應就可以確保一定品質，畢竟以「國立臺灣文學館」之名號出版的書籍，是具有一定的權威性，讀者也抱有一定的信賴感。投注人力、時間、經費的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若每次出版時都能一次到位、流傳久遠，儘管在讀書出版市場是小眾，也定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伍、結語

以上以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為中心，探討臺灣日語文學翻譯發展

的現況與所面臨之挑戰。首先，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類型方面，除了作家作品類外，文藝史料類也是下一階段之優先工作。此工作若要順利推展，須仰賴充分的經費與適當的人力。目前經費方面，國立臺灣文學館每年都計畫性地編有經費，以推動計畫和出版工作，但優秀且願意投入此工作的人才必須持續培養，以免產生斷層。

出版品採中日文並列的排版方式，除可方便讀者與研究者外，也可擴大臺灣文學研究的領域與視野，應是將來較適切的作法。但日文輸入工作向來不受重視，常常被視為僅是翻譯的前置作業，翻譯才是計畫的重點，真是臺灣文學界的一大憾事。殊不知正確的打字稿與校注不但可以減少翻譯的錯誤，也可提升讀者對原文的認識，並提供研究其他範疇的可能性。至於中文譯文方面，品質也還有向上的空間，若能將文學翻譯提高至翻譯文學的境界，才是文壇的一大福音。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方面，對於出版品除落實審查制度外，也應制訂編輯體例、校注基準與作業流程等，以便在計畫的執行過程中就進行嚴格把關，並確保計畫成果之品質。而在學術界，翻譯的評論並不盛行，尤其日語方面的譯評更是貧乏。翻譯的評論除可為翻譯品質把關外，還可形成良性競爭，進而提升翻譯品質。此外，重新審視譯者在文壇和學術界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意即譯作等同創作，譯作價值等同學術論文；譯者等同作家，譯者地位等同論文發表者。

最後，有公部門的支持，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除在內涵方面的提升外，編輯排版、印刷裝幀也應可更精緻進步，以希冀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品的讀者能從作家、研究者，擴及至一般社會大眾，而擺放於書架上的出版品也能成為居家一隅提升質感的存在。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王惠珍（2014）。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Wang, H. C. (2014). *Colonial writing within sound of war drums: The trajectory of Long Yingzong's literature*. Taipei, Taiw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余光中（2012年11月）。我對翻譯的看法。吳清山（主持），翻譯專業發展與品質提升。2012臺灣翻譯研討會，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
- 【Yu, K. C. (2012, November). Wo dui fanyi de kanfa. In C. S. Wu (Chair),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aipei, Taiwan.】
- 汪淑珍、白乃遠（2012）。「臺灣文學作家全集」演化探析。空大人文學報，21，33—70。
- 【Wang, S. C., & Pai, N. Y. (2012). The analysis of evolution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Taiwanese authors. *Journal of the Liberal Arts*, 21, 33-70.】
- 芒迪（Munday, J.）（2007）。翻譯學導論：理論與實踐（李德鳳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原著出版年：2001）
- 【Munday, J. (2007).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D. F. Li, Tran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1)】
- 阮美慧（2011）。編序。載於阮美慧（主編），錦連全集（頁5—16）。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 【Juan, M. H. (2011). Bian xu. In M. H. Juan (Ed.), *Jinlian quan ji* (pp. 5-16).

Tainan, Taiw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林水福（1998）。漫談日本作家全集。文訊，155，39—41。

【Lin, S. F. (1998). Mantan Riben zuojia quanji. *Wenhsun*, 155, 39-41.】

林肇豐（2006年10月）。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本書簡介。取自 http://www.nmtl.gov.tw/publicationmore_149_162.html

【Lin, Z. F. (2006, October). Major texts of Taiwanese literary criticis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921-1945/Benshu jianjie. Retrieved from http://www.nmtl.gov.tw/publicationmore_149_162.html】

柳書琴（2012）。《臺灣新民報》向右轉：賴慶與新民報日刊初期摩登化的文藝欄。臺灣文學研究集刊，12，1—40。

【Liu, S. C. (2012). *Taiwan New People Newspaper turned right: Lai Qing and the modernized literary column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daily publication. NTU Studies in Taiwan Literature*, 12, 1-40.】

勒菲弗爾（Lefevere, A.）（2010）。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夏平譯）。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原著出版年：2004）

【Lefevere, A. (2010).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uo of literary fame* (P. Sha, Trans.).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4)】

教育部（2013年7月）。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試辦學校計畫。取自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0217161130F0B192&s=318F4A8B0B5B62B3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3, July). *Jiaoyubu buzhu dazhuan xiaoyuan tuidong jiaoshi duoyuan shengdeng zhidu shiban xuexiao jibu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0217161130F0B192&s=318F4A8B0B5B62B3】

教育部（2016年5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取自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629>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6, May). *Zhuanke yishang xuexiao jiaoshi zige*

shending banfa. Retrieved from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629>】

許達然（2007）。總導讀。載於戴文鋒（主編），*葉笛全集*（頁 5—41）。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Hsu, D. R. (2007). Zong dao du. In W. F. Dai (Ed.), *Yedi quanji* (pp. 5-41). Tainan, Taiw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陳瑞山（2014）。以技術報告作為口筆譯學術審議要件之探討。*編譯論叢*，7（2），155—170。

【Chen, R. S. (2014). A discussion on using the practical report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s an assessment for academic promotion.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7(2), 155-170.】

陳萬益（1998）。現階段臺灣文學的建設工程——談日據時代作家全集的編纂。*文訊*，155，31—32。

【Chen, W. Y. (1998). Xianjieduan Taiwan wenxue de jianshe gongcheng: Tan rijū shidai zuojia quanji de bianzuan. *Wenhsun*, 155, 31-32.】

陳萬益（2007）。臺灣文學系所十年省思。*文訊*，265，52—53。

【Chen, W. Y. (2007). Taiwan wenxue xi suo shi nian shengsi. *Wenhsun*, 265, 52-53.】

陶振孝（2006）。淺談日本現代詩歌的翻譯。載於王秀文（主編），*中日語言翻譯與跨文化交際*（頁 368—369）。北京：世界知識。

【Tao, Z. X. (2006). Qiantan Riben xiandai shige de fanyi. In X. W. Wang (Ed.), *Zhong Ri yuyan fanyi yu kua wenhua jiaoji* (pp. 368-369). Beijing, China: World Affairs Press.】

單德興（2013）。*翻譯與脈絡*（修訂版）。臺北：書林。

【Shan, T. H. (2013). *Translations and contexts* (Rev. ed.). Taipei, Taiwan: Bookman Books.】

單德興（2016）。*翻譯與評介*。臺北：書林。

【Shan, T. H. (2016). *Translations and criticisms*. Taipei, Taiwan: Bookman

Books.】

彭小妍（1998）。談臺灣作家全集的編纂。文訊，155，33—35。

【Peng, H. Y. (1998). Tan Taiwan zuojia quanji de bianzuan. *Wenhsun*, 155, 33-35.】

黃意雯（2013）。譯序。載於周華斌（主編），銀鈴會同人誌（1945—1949）（頁 IX—XI）。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Huang, Y. W. (2013). Yi xu. In H. B. Chou (Ed.), *Yin ling hui tong ren zhi (1945-1949)* (pp. IX-XI). Tainan, Taiw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葉石濤（1946年5月10日）。關於菸草。中華日報，四版。

【Ye, S. T. (1946, May 10). Guanyu yancao. *China Daily News*, p. 4.】

龍瑛宗（1946年9月28日）。傳統的內在力量——吳濁流的《胡志明》——。中華日報，四版。

【Long, Y. Z. (1946, September 28). Chuantong de neizai lilian: Wuzhuoliu de *Huzhiming*. *China Daily News*, p. 4.】

日文文獻

黃意雯、高野史惠（2007）。張文環在日期間中の小説における日本語表現——誤用分析の観点から『天理臺灣學報』16, 91-102.

【Huang, Y. W., & Takano, H. (2007). The Japanese in novels by Zhang Wen-Hu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enri Taiwan Gakubo*, 16, 91-102.】

高橋明郎（2016a）。鍾肇政の日本文に見える特徴について——『苦雨戀春風』と周辺資料から——『香川大学経済学部研究年報』55, 1-26.

【Takahashi, A. (2016a). The Japanese in love letters by Chao-Cheng Chung. *Annals of Economic Studies Kagawa University*, 55, 1-26.】

高橋明郎（2016b）。書評：張良澤・高坂嘉玲編『苦雨戀春風 青年鍾

肇政初戀情書集』 『天理臺灣學報』 25, 196-200 .

【Takahashi, A. (2016b). Review: “KU-Yu Lien-Chun-Feng: Love Letters by Chao-Cheng Chung”. *Tenri Taiwan Gakubo*, 25, 196-200.】

英文文獻

Reiss, K. (2000). *Translation criticism: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E. F. Rhodes, Trans.). London, UK: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1)

Venuti, L. (2008).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